

Discussion on the Motiv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of Misinformation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Niu Jing Xu Miao

Abstract: Misinformation spread widel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expression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and the public's cognitive level and risk tend to make it easier for the public to accept misinformation. Truth bias and confirmation bias of the public make it easier for public to believe misinformation.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has a lot of impacts on the society, affecting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of the public and thus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life,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ffects the public's health cogni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redu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media and aggravate the information disorder. The effectiveness of misinformation warnings issued by media or platforms to protect audiences from misinformation remains questionable.

Key words: Misinform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Bias; Platform responsibility; Social influence

新媒体环境下错误信息的传播动因 与社会影响探讨

牛 静 徐 苗

摘 要: 互联网时代的错误信息传播广泛, 信息来源、信息表达形式和信息中的情感特质加速

作者简介: 牛静,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苗,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课题项目: 本研究得到华中科技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的资助。

文章引用: 牛静, 徐苗. 新媒体环境下错误信息的传播动因与社会影响探讨 [J]. 中国新闻评论, 2023, 4 (1): 1-11.

<https://doi.org/10.35534/cnr.040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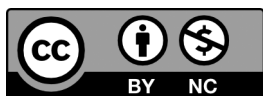
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公众的认知水平和风险倾向使其更容易接受错误信息，公众存在的真相偏见和确认偏见加剧了公众对错误信息的信任。错误信息传播对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影响公众的理性决策进而影响政治生活，误导性的信息影响公众的健康认知，同时还会降低媒体信誉，加剧信息失序。媒体或机构平台会发出错误信息警告以保护受众免受错误信息的误导，但其效果仍值得商榷。

关键词：错误信息；信息传播；偏见；平台责任；社会影响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网络平台为公众参与讨论社会话题提供了渠道，但也容易成为各主体传播错误信息、挑起恶性争端和获取利益的沃土，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匿名性与及时性，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错误信息的产生和传播。^① 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② 公众能够通过分散式网络迅速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2013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针对互联网信息环境提出了警告：大规模数字错误信息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威胁之一。^③ 虽然信息失序现象由来已久，但与传统媒体时代的错误信息相比，如今这种信息混乱的复杂性远超从前。^④

错误信息也被称为事实误解，包括故意、无意制造或传播虚假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错误信息在公众日常经验或科学研究中被定性为错误的、子虚乌有的、没有得到认同、缺乏依据的一类信息，但是当它们被有意无意地删减、篡改，或者包装上了其他合理的“外衣”，便会让人

① Wu L, Morstatter F, Carley K M, et al.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media: definition, manipulation, and detection [J]. ACM SIGKDD Explorations Newsletter, 2019, 21 (2): 80–90.

② Vegetti F, Mancosu M.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motivated reasoning on misinformation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37 (5): 678–695.

③ Bauer P C, Clemm von Hohenberg B. Believing and sharing information by fake sources: An experiment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1, 38 (6): 647–671.

④ Cabañes J V A. Digital disinformation and the imaginative dimension of communication [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0, 97 (2): 435–452.

们误以为是正确的，人们就会对其进行传播。^①之前研究者多关注虚假消息（Disinformation）、假新闻（Fake News）及传言（Rumor）等，但基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这一概念具有价值中立性及意义延展性的特点，且与互联网时代信息失序的相关讨论密切相关，最近几年传媒业界与学界对其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

一、错误信息：相似概念中的中性术语

在过去的讨论与研究中，谣言（Rumor）、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假新闻（Fake News）等概念往往交叉出现，概念的混用加剧危机时期公共话语的混乱和撕裂，影响言论自由的空间。尽管以上概念共同指涉不正确或者不准确的信息，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厘清相似概念的边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错误信息”。

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的典型定义是“为了政治、个人或经济利益，故意制造和分享虚假的或被操纵的信息，旨在欺骗和误导受众”。值得注意的是，虚假信息并不必然是错误的，事实要素焦点的变化或者特定信息要素的“留白”都可能扭曲人们对社会特定问题的理解，正确信息被操控后也能达“误导”的目的。^②与错误信息相比，虚假信息不仅仅指信息不正确，还限定其传播意图为故意制造和故意分享错误信息以造成伤害。^③

由于单词形态相似、翻译习惯差异等原因，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常常与错误信息相混淆。一方面，“disinformation”（虚假信息）与“misinformation”（错误信息）两个单词具有相同的词根，容易引发误用；另一方面，翻译习惯不同也加剧了概念使用的迷惑性，部分研究将“misinformation”译为虚假信息，但是概念内涵仍然是指性质错误或不准确的信息，在这里，“虚假”一词更强调信息的性质是虚假的，而非信息传播的意图。^④另外，关于虚假信息的概念界定存在着两种分歧，直接导致了概念使用时的混乱。一种观点认为虚假信息是与错误信息互斥的概念，即虚假信息是出于特定的目的、有意散布的、不正确或不准确的信息，而错误信息则是无意为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虚假信息是错误信息的子集，不以信息发布的意图性作出界定依据——无论出于错误、疏忽、无意识的偏见还是有意的欺骗，只要信息的语义内容错误或不准确，就构成了错误信息。本文讨论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失

① 温家林，张增一. 错误信息的产生、传播及识别和控制——错误信息已有研究评述[J]. 科学与社会，2018（3）：108-122.

② 杨洸，郭中实. 数字新闻生态下的信息失序：对数据主义的反思[J]. 新闻界，2021（11）：14-21，31.

③ Wardle C, Derakhshan H. Thinking about “information disorder”: Formats of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mal-information [M] // Iretton Cheryl, Posetti, Julie. Journalism, “fake news” & disinformation. Paris: Unesco, 2018: 43-54.

④ 刘海龙，于瀛. 概念的政治与概念的连接：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虚假信息与假新闻的概念的重构[J]. 新闻界，2021（12）：23-40.

序现象, 错误信息不仅包含有意的、不准确、不真实信息, 还包括无意的或其他形式的不准确、不真实信息。

假新闻 (Fake News) 指以新闻形式传播的错误信息, 这一定义阐明了假新闻与错误信息的关系, 即假新闻是错误信息的一种形式。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John Trump) 频繁使用“假新闻”一词指责与自己立场不一致的媒体, 引发了全球大量媒体和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关注, 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让公众对这个总括性术语表示担忧。^① 首先, 假新闻已成为一个流行术语, 被滥用来表示信息环境中一切不准确的东西, 其内涵扩大化不利于概念定义的专业性与规范性; 其次, 这一概念的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 “假”一词和真实性有关, 即不是真的, 是模仿的或伪造的, 而“新闻”是指新发生的或值得注意的事实信息, 因此与“虚假”和“新闻”的含义相矛盾,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 二者组合而成的概念是不恰当的。^② 再次, 这一术语在西方还存在着与生俱来的缺陷, 即“假新闻”容易被政治化, 并被利益集团用作对抗新闻业的武器, 即指控新闻机构故意欺骗公众。

除了以上三种常见的相似概念, “谣言 (Rumor)” 一词也用于指代不准确的信息。谣言指未经证实的信息, 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谣言的重要特征是模糊性和重要性, 首先, 谣言的信息内容不全面、不准确, 给公众以模糊的印象, 使公众难以依据已有证据进行真伪判断; 其次, 谣言的主题往往是备受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 具有一定的讨论价值与社会意义, 所以更容易吸引信息储备本就不足的公众的注意。^③ 谣言中被确认为不正确或者不准确的信息属于错误信息, 如果是带有特定目的进行传播的错误谣言则属于虚假信息, 当假新闻没有被证实真伪时, 也属于谣言。

尽管以上概念都包含了事实上不正确的信息, 但是它们在目的性质、传播形式等方面不尽相同。在任何用户都可以发布任何内容的新媒体平台上, 研究人员甚至社交网络媒体的管理员, 都很难确定一条错误信息是否是故意制造或故意传播的, 所以这些信息很难被定义为假新闻或者虚假消息, 但是通过准确的信息事实核查, 这类信息可以被归类为错误信息。为了方便讨论, 我们将错误信息作为一个总括术语, 包括互联网上传播的所有虚假的或不准确的信息。

① Ha L, Andreu Perez L, Ray R. Mapping recent development in scholarship on fake news and misinformation, 2008 to 2017: Disciplinary contribution, topics, and impact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21, 65 (2): 290-315.

② Kapantai E, Christopoulou A, Berberidis C, et al.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disinformation: Toward a unified taxonomical framework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1, 23 (5): 1301-1326.

③ Bradshaw S, Howard P N.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ocial media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8, 71 (1. 5): 23-32.

二、基于信息特点、个体特质和公众心理分析错误信息的传播动因

公众为何会传播与信任错误信息？今天错误信息的形式丰富多样，从声音到文字，再到图像与视频，错误信息以越来越逼真的面貌呈现给公众。无论是错误信息本身的特点还是个体的认知水平、风险倾向、刻板偏见等心理机制都为错误信息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一）信息来源、形式与情感特质：加速错误信息的传播

研究者对具有什么样特点的信息更容易被广泛传播进行了探讨，发现信息来源、信息的表现形式和其中的情感特质加速了错误信息的传播。

首先，信息来源影响公众的信息转发行为。一方面，主流媒体上的错误信息更容易被分享，因为主流媒体代表着社会主流的价值认同与观点立场，公众会选择信任主流媒体，所以用户往往会转发来源于主流媒体的信息，以主流媒体为传播载体的错误信息被分享的概率被大大提高。^①另一方面，公众会倾向转发熟人分享的错误信息，因为熟人被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认为来自朋友和家人的信息是准确的，所以公众更容易受到社交网络中熟人传播的错误信息的影响。此外，个体的社交网络往往呈现同质内容，信息多样性较小，因此错误信息被发现的概率也较少，处于同一社交网络的成员会继续传播错误信息，扩大其影响。^②

其次，信息形式会影响公众对错误信息的处理。与文字信息相比，公众对图像信息的信任度更高，使得以图像形式发布的错误信息更容易被受众分享。图片将信息聚合成一种引人注目、易于接受和共享的格式，在相同的语境中，图片证据更能彰显信息的连贯性、独创性与真实性，并且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有利于受众建立起与信息的相关性，帮助公众建立起与信息内容一致的身份认同感。^③在高度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公众的信息感知系统易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图片形式的错误信息可以凭借自身表现出来的真实性吸引公众，并帮助公众重新校准证据感，维持个体信息系统的稳定，从而进入下一轮传播。^④

最后，含有强烈情感表达的、特别是带有负面情绪的错误信息更容易被传播。研究发现，

^① Tsang S J. Motivated fake news perception: The impact of news sources and policy support on audiences' assessment of news fakeness [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21, 98 (4): 1059-1077.

^② Kertysova 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sinformation: How AI changes the way disinformation is produced, disseminated, and can be countered [J].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018, 29 (1/4): 55-81.

^③ Krafft P M, Donovan J. Disinformation by design: The use of evidence collages and platform filtering in a media manipulation campaign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37 (2): 194-214.

^④ Hameleers M, Powell T E, Van Der Meer T G L A, et al. A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lies?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multimodal disinformation and rebuttals disseminated via social media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37 (2): 281-301.

与中性故事相比,包含可能引起厌恶、恐惧或幸福等情绪的信息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范围也更广。这是因为情绪唤醒会增加人们传播信息的意愿,错误信息中的情绪性描述、价值性讨论等因素通过对公众施加短暂的、强烈的外部刺激,唤醒公众深层感情,无论信息的真实价值如何,人们都更倾向传播会引起接收者情绪反应的信息,此类错误信息被传播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此外,极端、负面的错误信息不仅更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还会让暴露其中的公众产生压力,并诱发高觉醒状态(High States of Arousal),持续放大群体焦虑,从而导致公众更加关注相关信息。沃索菲(Vosoughi)等人通过整理推特上发布的12000多条新闻后发现,与常规的新闻内容相比,错误信息更能激发恐惧、厌恶和惊讶等情绪反应,也比真相传播得更快和更广。^①

(二) 自我效能感与风险倾向: 影响公众对错误信息的接受

个体特质对公众信息处理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除了年龄、职业、民族、地区等经典的人口社会学指标,自我效能感与风险倾向是影响公众接受错误信息的两个重要的个体特质。

首先,与我们常识性的判断不同的是,自我效能感越高的公众,可能会更容易相信并传播错误信息。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其行为能力的信念,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后期信息处理行为。研究者解释了这一现象:其一,拥有较低自我效能感,并对自身的行为能力有较低自我评价的人,在面对错误信息时,会向外界寻求更多信息以辅助自身做出决策,因此他们不会轻易相信错误信息。其二,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相信,他们认为经过自己评估的信息就具有可信度,所以也更愿意与他人分享,从而使错误信息广泛传播。所以与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人相比,一旦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相信了错误信息,他们在网上传播错误信息的能力更强。^②

其次,具有高风险倾向(Risk Propensity)的社交媒体用户更有可能成为网络错误信息的受害者,风险倾向性越高,个体接受与传播错误信息的概率也会越高。在日常生活中,不同个体愿意接受风险的程度各不相同。研究显示,媒体会对Facebook等社交网站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报道,公众对这些风险意识和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他们的信息处理行为,对风险没有兴趣的群体不太会与有争议的材料互动,也不太可能分享不被他人认可的信息,厌恶风险的群体甚至会选择忽略这些信息,而具有高风险倾向的群体往往积极参与在线信息的传播,进行评论与转发,同时,高风险倾向人群也会更容易成为错误信息的受害者。

^① Wang R, He Y, Xu J, et al. Fake news or bad news? Toward an emotion-driven cognitive dissonance model of misinformation diffusion [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30(5): 317-342.

^② Altay S, Hacquin A S, Mercier H. Why do so few people share fake news? It hurts their reputation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2, 24(6): 1303-1324.

（三）“真相偏见”与“确认偏见”：加强公众对错误信息的信任

大量实验数据表明，人类在识别信息欺骗方面相当无力。在许多相关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区分谎言和真相，发现人类辨别错误信息的能力仅略高于偶然性，实验中典型的准确识别率在55%到58%之间，100多个实验中超过1000名参与者的平均准确率为54%，这是因为公众的心理机制在发生着作用。

大多数人会存在固有的“真相偏见”（Truth Bias），即他们倾向于认为收到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首先，公众时常需要依靠外界信息进行信息处理与行为决策，所以形成了对信息的“天生信任”与“天生依赖”，表现为“普遍易受骗”特质，即公众对外界信息的期待较高，那么对信息的接收度也较高。^①其次，当外界传递的信息属于未知领域时，公众无法启动已有知识储备对其进行评估与处理，便会接受与信任外界的信息，而无论其正确与否，以便填补自己的信息空白，避免信息焦虑与决策无能，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公众也会更加容易接受那些他们不完全理解的观点。再次，大部分人存在浅层次阅读的习惯，《福布斯》报道称，“社交网络上共享的所有链接中有59%根本没有被点击，这意味着人们对大部分文章的分享并非基于实际阅读”^②。公众容易被新闻标题或引言所吸引，接受片面、新奇、短小的错误信息，浅薄的阅读不利于公众对信息进行深度思考与事实核查，加剧了对错误信息的信任。

“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心理机制导致公众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相信他们已相信的错误信息。在日益碎片化、高选择性的媒体环境下，人们会“选择性曝光”在自己想要的信息之中，尤其是倾向去阅读与自己先前观念一致的信息，这种“确认偏见”表现为人们会对先前的认识信念超过了对事实正确性的坚持。简言之，公众更有可能选择和不加批判地接受与自己观念一致的错误信息，而避免或反驳那些与自己观念不一致的真实信息。因为与自身观念一致的信息个人更熟悉、更容易处理，在个体内部的信息网络中也更受支持，而接触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会导致个体认知失调，破坏机体和谐与稳定。因此，当错误信息不包含与现有知识相矛盾的元素时，公众对一致性信息的兼容性“增加了错误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降低了成功纠正的可能性”^③。

① Gerosa T, Gui M, Hargittai E, et al. (Mis) informed during COVID-19: how education level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gap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15): 22.

② Serrano-Puche J. Digital disinformation and emotions: Exploring the social risk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21, 31 (2): 231-245.

③ Hameleers M, Van der Meer T G L A. Misinform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How effective are political fact-checker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0, 47 (2): 227-250.

三、新媒体环境下错误信息的社会影响

在新媒体环境中，错误信息传播快、流传广、留存久，导致其影响也更强。政治类错误信息不仅干扰公众理性决策，还被用于党派斗争，破坏民主；关于健康的错误信息很容易被接受并广为传播，在损害公众身体健康的同时，还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错误信息的肆虐直接影响了新闻媒体的信誉。

（一）错误信息影响公众理性决策、威胁民主政治

政治类错误信息主要以假新闻的形式对政治生活产生影响，此类旨在影响政治进程的错误信息被认为是对民主的重大威胁。在国外公共生活的关键事件中，含有错误信息的垃圾新闻像野火一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社交媒体机器人故意放大政治边缘观点，利益集团利用媒体平台设定政治或媒体议程、审查言论自由、控制在线信息流用以推动公众舆论朝着一定的目标发展。^① 在一项针对美国公民的意向调查中，大约 40% 的公民经常遇到以假新闻形式出现的错误信息，并且许多阅读假新闻的人选择相信这些新闻。^② 政治错误信息不仅影响公众获取正确的决策依据，还诱导公众冲动思考，不能理性决策，加剧政治两极分化，威胁民主政治。

首先，错误信息会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误导，破坏政治民主氛围。从合法宣传到操纵选举，政治错误信息直接影响了公众在政治参与中的价值判断与立场决策，尤其是当党派支持者长久处在“政治回音室”中，没有机会接触到相反信息来纠正错误时，这种孤立的信息结构将会助长外部群体的敌意，并使偏见正常化，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其次，规模庞大的政治错误信息淹没了公众，阻碍了公众获取正确的决策依据。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政治依赖于消息灵通的公众，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③ 由于政治错误信息的战略传播越来越多，公众不再盲目信任政治信息，而是会更加谨慎对待政治信息，投入更多成本去辨别信息的真伪，许多事实信息也会成为怀疑的目标。在时间与精力有限的情况下，混乱的信息环境严重影响公民做出高效率的信息选择与明智的政治决策。再次，政治错误信息往往通过放大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刺激公众感性思维，忽略理性思考，在政治参与中，人们确认和强化其党派身份的动机可能会超过做出理性决策的欲望。

① Starbird K, Arif A, Wilson T. Disinformation as collaborative work: Surfacing the participatory nature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operations [J].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2019, 3 (CSCW) : 1-26.

② Freeze M, Baumgartner M, Bruno P, et al. Fake claims of fake news: Political misinformation, warnings, and the tainted truth effect [J]. Political behavior, 2021, 43 (4) : 1433-1465.

③ Amazeen M A, Bucy E P. Conferring resistance to digital disinformation: The inoculating influence of procedural news knowledge [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19, 63 (3) : 415-432.

（二）错误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公众的健康认知

在 COVID-19 流行病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我们不仅仅是在抗击流行病，我们还在和信息疫情作战，错误信息比病毒传播得更快、更容易，而且同样危险”。^① 与病毒一样，错误的治疗与预防方法也在大肆传播，它们通过用科学外衣的伪装及歪曲事实信息使更多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健康错误信息对公众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错误信息披着健康的科学“外衣”迷惑公众。健康科普对公众维护自身机体正常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期，公众对健康信息的需求增多，这为错误信息的肆意传播提供了机会。关于健康的错误信息不仅打着“为了健康”的旗号，还会利用社会常识来包装自己，公众不仅难以辨别真假，还会基于逻辑惯性信任被包装过的错误信息，如“喝酒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这一错误信息就借助了“酒精能杀菌消毒”的医学常识来欺骗公众。此外，错误信息的叙述以不容置疑、肯定、权威的科普传播语态为主，同时辅以恐惧说服。这些信息以关切的口吻呼吁公众关注健康，同时引发个体的恐惧、焦虑等情绪。当处在恐慌和怀疑中时，基于对信息强烈与迫切的需求，公众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一旦错误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受，就很难纠正，而且干预的有效性因每个人的个人参与程度、文化程度和社会人口特征而有所不同，治理难度也大大提升。^②

第二，关于健康的错误信息时常通过歪曲事实信息误导公众。如关于健康的错误信息利用其与事实信息针锋相对的特点，加强了公众的记忆点，使错误信息的影响更为深刻。同时，与健康相关的错误信息往往基于事实信息而发出，但是对事实信息的误导性解读，这类信息更容易被公众所接纳与信任。如有消息称接种疫苗与童年自闭症密切相关，于是许多英国父母决定不给孩子接种疫苗，尽管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特定疾病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实验数据支持与部分公众信任，但仍会有人觉得自己最新接收的消息补充了已有的信息，是对以往疫苗观点的更正与完善，并选择相信这一关于健康的错误信息。

（三）错误信息损害媒体信誉、降低公众信任度

一项关于美国媒体信任的报告发现“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心受到侵蚀”，而在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③ 错误信息的传播对媒体的整体公信力产生了负面影响。

①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总干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 [EB/OL] . (2020-02-15) [2022-12-09] . <https://www.who.int/zh/dg/speeches/detail/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② Krishna A, Thompson T L. Mis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A review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misinformation scholarship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21, 65 (2): 316-332.

③ Martens B, Aguiar L, Gomez-Herrera E, et al.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news media and the rise of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J]. JRC Working Papers on Digital Economy, 2018.

首先,公众发布新闻的审核门槛很低,这为错误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创造了机会,从而影响了媒体的信誉。如今,报道行为不再是专业记者的专属领域,普通公民也能通过网络媒体参与新闻制作过程。一方面,遍布各地、身临现场的公民往往能为新闻媒体提供最新最热的新闻素材,但是公民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新闻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面对海量的新闻投稿,以及争分夺秒的热点抢夺战,新闻媒体不得已放宽了审核的标准,使得没有经过严格核实的信息也被发布出来,这影响了媒体平台的信誉。虽然公民对新闻制作的民主化有推动作用,但这同时也是公众对新闻信任幻灭的平行过程。^①

其次,被武器化的假新闻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正与中立,降低了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假新闻的概念分为两个维度,包括假新闻体裁(The Fake News Genre)与假新闻标签(The Fake New Label),前者指媒体因失察而无意发布的新闻形式的错误信息,后者则是利益集团对与自己立场相悖的新闻报道的指责。^②假新闻标签下的内容可能是真实内容,但是由于损害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被其污名化为假新闻,利益集团通过其他媒体对不利于自身的新闻与媒体进行攻击,以改变公众的态度,掌控社会舆论方向,假新闻在利益斗争中逐渐“武器化”,成了舆论战的工具,使得新闻媒体丧失了原有的公正与中立,从而降低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

四、余论:错误信息警告是行之有效还是适得其反?

错误信息警告是指专业组织对具有误导性的信息进行的审查与标记,目的是为了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和接受。例如,事实核查网站(Factcheck.org)、政治真相(Politifact)等组织都是调查政治人物和新闻组织所作声明的真实性的组织,它们为公众提供关于信息真假的参考性建议。社交媒体针对存在争议的信息,通过标记、警告的方式提醒公众注意甄别信息真伪。如社交软件Instagram设置了错误信息弹窗功能,弹窗会在用户将要转发存在争议的信息时弹出,同时平台会大幅降低这些帖子的传播机会,但是用户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阅读、信任及分享这些信息。可以说错误信息警告主要是希望遏制或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但研究者发现其实际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首先,国外研究者发现,被警告的错误信息可能不是错误的,那么,这样的警告信息会影响公众的正确认知。一方面,无论是人工还是机器审核,对公众的警告信息可能仍会存在事实

^① Jones-Jang S M, Kim D H, Kenski K. Perceptions of mis- or disinformation exposure predict political cynicism: Evidence from a two-wave survey during the 2018 US midterm elections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1, 23 (10): 3105-3125.

^② Egelhofer J L, Aaldering L, Eberl J M, et al. From novelty to normalization? How journalists use the term “fake news” in their reporting [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1 (10): 1323-1343.

疏漏或者价值偏向,当接收到错误的警告时,公众对客观事实的记忆会被损坏,并被误导去丢弃真实信息,拒绝接受与此警告相关的其他准确信息,甚至会参与到错误信息的传播中。另一方面,错误信息警告有可能会被恶意利用,如利益集团可能会对事实上正确但对自身不利的新闻发出错误信息警告,以控制新闻信息和塑造公众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公众更加难以辨别信息真伪,甚至沦为错误信息的追随者与传播者。

其次,针对错误信息的警告一般是粗略且低效的,会降低公众关于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感知准确性,影响正确记忆。当信息具有误导性时,对信息的不信任和拒绝是有益的,但当不信任和拒绝蔓延到事实信息时,错误信息警告的潜在影响就会变得明显。一方面,公众频繁接受关于错误信息的警告会导致对自己的记忆感到不确定,逐渐提高信息怀疑度及降低对自我信息评估能力的信心;另一方面,一般警告指涉模糊,对象不明,过度使用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信息创建者与传播者为了避免被标记为错误信息,干脆不再发布或传播可能与错误信息相关的观点,公众提前进行自我审查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信息的传播。^①

其实,关于错误信息的讨论仍在继续,以上诸多研究成果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错误信息的传播动因与影响,反思现有的遏制错误信息传播的措施是否有效。以后研究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新媒体环境下错误信息的传播机制,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实现良好的网络信息环境治理建言献策。

^① Pielemeier J. Disentangling disinformation: What makes regulating disinformation so difficult? [J]. Utah L. Rev, 2020: 917.